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学者文选

杜

敬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杜敬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敬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选.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9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5004-3769-2

I. 杜… II. 中… III. ①杜敬—文集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5623 号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王应来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359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编者的话

领导让我负责编辑杜敬同志的这部论文选集，我感到非常荣幸。如今杜敬同志已是 82 岁高龄的老人，他早在青年时期就走上了革命的新闻出版和理论宣传阵线，长年战斗在河北地区。1961 年被中央调进北京，任《红旗》杂志编委兼副秘书长。在十年动乱中，杜敬同志受尽折磨，但他很少跟别人谈起这些，只是在一篇文章中，从另一侧面谈到自己的感受：“我终生难忘的是，‘文革’刚刚开始，自己毫无思想准备，一阵狂风暴雨袭来，劈头盖脑，打得晕头转向，以致说了一些违心的话。直到现在，或者将来，自己都不能只说是受迫害的，而要首先承认自己也没有顶住。正是由于记取了这一条教训，所以在后来的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条是很自觉的，因此而得罪了个别领导人也没有丝毫犹豫。”（见《杜敬文稿》）

1978 年，杜敬同志被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行政管理局局长、院务委员，1980 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第一副总编辑、编审、党组书记，1981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党组书记。1984 年 6 月离休，但笔耕不辍，而且“雄关难挡勇士路，老马嘶鸣不停蹄”（杜敬诗句），到耄耋之年还要追赶 modern：学电

脑，而且居然早已进入“人一机”合一的佳境。在一个老年人交流使用电脑心得的座谈会上，他即席念了一段顺口溜：“年方八旬不算老，挺着腰板敲电脑；四本小书已问世，再出四本还嫌少。”所说已问世的“四本小书”，当即《冀中导报史料集》（1990年出版）、《冀中报刊史料集》（1995年出版）、《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1997年出版）、《杜敬文稿》（1999年出版）。至于“再出四本”的宏愿，并非空喊，而是在脚踏实地地做着。2000年出版了《杜敬文稿续集》，2002年出版了《生活散歌》。

特别需要讲的是：前三部史料集都是抢救历史的珍贵文献，功在千秋，但是这些书的选题组稿、编辑加工和出版印行等等，人们怎能知道其中存有多少艰难？为任何一本书的成稿，都要有一二百人提供资料，数十人执笔，作者均已年迈体衰，开会、通信、改稿等等，并无一分钱稿费和编辑费。当年保定市一位离休干部收到书后给杜敬同志写信：“作为一个人，尤其在当今的商品经济年代，您已近八十岁，而且有病缠身，如果没有一腔的爱国敬业之心，没有坚强的毅力，哪能连续不断地还从事这样繁琐的编辑任务？”

从总体上看，杜老的研究成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在理论研究上，一向从实际出发，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把握关键，深入开掘，实事求是地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是杜老最闪亮的治学之本。应该说，作者关于中国土地改革问题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从本书所选的有关土改的论文中，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是在搜集大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对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总结了历史的伟大功绩和经验教训，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平分土地”侵犯中农利益，以及把富农划到地主一边扩大打击面的这两种错误。以往有关土改历史的著述中，对于土改历史

上曾经出现过的“左”的偏差，或取回避态度，或轻描淡写。杜老所作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国土改史研究的创建，而且对于清理中国民主革命中在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亦有普遍的启迪作用。

《在土地改革中没收和分配土地》一文，曾发表于1982年的《中国社会科学》。作者首先列出多种典型调查，从中归结出没收和分配土地三条主要根据，特别是其中第三条：“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不是因为这些农民太穷了，并不是越穷越光荣，也不是越穷越有理。”只是为了“剥夺地主阶级进行剥削的手段，使其无法再继续剥削农民”。文章在结尾部分还特别论述了“穷与富”的问题。作者说：“共产党从来不喜欢穷，不提倡穷。正是为了使穷人都富起来，才领导农民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共产党从来不反对富，反对的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致富，提倡的是劳动致富，越富越好。”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论述。将研究历史与指导现实结合起来，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理论开拓。

文中特别提出“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因为人们在观念上常常总把地主和富农归为一类，在过去的土改中也出现过将地主、富农同等对待的“左”的错误。文中提出富农与地主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富农除了对贫苦农民进行封建半封建剥削外，一般自己也参加主要劳动，而地主则一般不参加主要劳动。”即使在富农当中，也有“劳动起家与剥削起家”的区别，指出：“提出这样一条原则，对鼓励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是很重要的。”在总结党的政策由限制和削弱富农经济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历史意义时，作者特别强调：“更重要的是，保存富农经济，发挥富农的生产积极性，很有利于保护中农，解除某些中农的疑虑，克服怕富的思想，有利于提高中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在20世纪

80年代初，这种对历史上“富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应该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这也是杜老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当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曾在一个座谈会上指出，可以请国务院各部委的同志把三十多年的历史演变做点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然后出书。乔木同志接着说：“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登了杜敬同志写的一篇关于土地改革的文章，我看很好，这方面的文章很需要。我们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要从对历史的总结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次会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开始组织出版大型的《当代中国丛书》。

（二）结合个人的革命实践经历，确定理论研究和写作的方向，因此所获成果堪称篇篇有血有肉，扎扎实实。杜老不是从书斋、不是从象牙之塔走出的学者，而是经历中原烽火，常年在农村的地道、堡垒户、青纱帐中同广大农民生死与共，以自己从青年时期就投身其中的新闻出版事业为立足点，和革命同志从农村战斗到新中国成立后，走进大城市办报搞宣传，再加上自己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研究和写作，因此成果的主要论题常常集中于中国的农民问题、土地改革问题、新闻出版和理论宣传问题等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本文集中一目了然。

比如《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的后退与前进》发表于1961年《红旗》杂志，作者对于党中央从1947—1950年前后所发出的关于土改的八个文件，进行了逐一的比较研究，分析每个后发文件与前发文件的“不同点”，最后得出结论：“土地改革的打击面越来越小，打击的对象越来越集中、明确；对于不同的地主富农的区别对待，越来越界限分明；对于地主富农的处理，后来比以前宽大；土地改革的步骤，分得越来越细，步子越来越踏实。”作

者亲历过土改运动，现在回过头来纵观和反思那段历史，文章又从更高的层面上总结出七条理论认识，特别指出：“对于当时政策上的一些改变，乍一看来，似乎是工作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其实是快了；有时似乎是后退了，其实是前进了。”辩证法来自革命的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 262 种报刊》文题似乎让人觉得只是对 262 种报刊的历史资料的追述，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这种追述尽管在文中占有不小篇幅，包括逐一分类和介绍，使那些即使只印行几期就被迫停刊的小报，在中华民族文字记载史上也要留下一道闪光；但这一切还不能说是本文的惟一主旨，本文的重要方面在于从理论上总结出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报刊发展变化的若干特点和规律（共六条）。这就是科学的历史研究。作者在文中说：“我有幸先后参加过县委、地委、冀中区党委三级报纸和几个刊物的编辑工作。对那些报刊的感情，对那些老战友的感情，对那八年战斗生活的不能忘怀，合成了一种责任感，促使我做这件事。”该文从 1985 年初稿，到 1994 年定稿，四易其稿，历时十年。

从杜老选择的研究和写作方向，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似乎应该从中深悟出点什么。

（三）立足于哲学思维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将各种问题分析得清澈透明。人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凡有哲学素养的人，凡能把握科学思维方法的人，他们面对纷纭繁复的各种情况，都能从所需解决的问题的角度迅速切入主题，头脑清醒，把准问题的脉络，犹如庖丁解牛一般将问题分析得明明白白，语言也绝无拖泥带水。我们以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前后杜老发表的文章来看。

例如，1955 年发表的《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及新闻必须完全真实问题》，文中特别强调“必须实事求是”，为达到这一点，作者提出了九条必须分清的界限，如“正确的批评与破坏性的批评。破坏性的批评有有意与无意之分”，“不可避免的问题与可能避免的，不能做到的与可能做到的，是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偶然的与一贯的，成绩与错误哪是主要的，不要片面、孤立地看问题”等等，提出了“不要乱扣帽子，事实最有说服力”，“要用同志式的态度、语调，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反对人身攻击”。文中强调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闻真实”，是分清各种界限的思想方法。

1956年发表的《批评报道的新问题》，主要提出当时在“不少的批评报道当中，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片面性、分寸不当、不确切的缺点。有的报道，把事情的优点错误夸大了，有的把缺点错误孤立起来进行叙述，看不出缺点错误在整个工作、整个事物中所占的地位；有的是从时间上把缺点错误孤立起来了，看不出来龙去脉，看不出事情发展的过程、前途和可能产生的结果，不知道是正在由好变坏呢，还是正在由坏变好；有的只从表面现象上去叙述缺点错误，却不进一步去分析所以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或者只谈主观原因不谈客观原因，这样就不容易看出问题的本质，甚至可能歪曲了问题的性质”。文中举出许多具体实例，说明什么是“片面性”的批评，但是随后又特别强调：“决不能因为要慎重，就又束手束脚了。因为，我们报纸上的批评还是不很经常、不很有力的。”很明显，这里充满着辩证的思想方法。

1957年发表的《报纸的性质、任务和几条基本原则》一文，此文应该首先被看做是一篇哲学论文，作者上来就指出：“我们的思想方法还有很多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很多，辩证法很少。当然，我们这次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还只是开始解决这个问

题。而且，能不能真正解决，不在于是否懂得了一些定义、结论，主要在于今后工作中的实际运用，看看是否把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我们认识和处理一切事物的观点和方法。”文中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一基本原理出发，谈报纸的性质和任务；在谈“几条基本原则”即党性、真实性、战斗性、群众性等问题时，都是充分体现着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观点，既讲清要“分清敌我界限、阶级界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是非界限、利害的界限”，讲清“对同一件事情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却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是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同时又特别强调反对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束缚着我们的思想不能解放”。文中对当时的教条主义表现指出了许多，如“只拿政策原则的框子去找适合这个框子的材料”，“按空气办事，一阵风”，“只能说党委或上级党报说过的话，不敢说自己的话”等等，指出：“我们的工作中所以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还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上存有片面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不相信群众，过低地估计了群众的鉴别能力，只怕散布不良影响，只怕引起混乱。”可以说，我们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回过头再读杜老当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其现实意义犹存。

但就是在那历史永远不能忘记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突然兴起而且扩大化。杜老惊呆了，沉默了，心在痛。请看一位老战友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在那场斗争中，为不把一些同志定为右派，他（按指杜敬）曾冒着风险提出过意见。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意见怎会被听得进去呢？他又怎能顶得住呢？甚至连他自己也受到了批评。可是，他一直把扩大化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既不上推，也不下卸。他正是以这种严以责己的心情，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不久，便为给一些

同志平反开始奔波了。”（见《河北报刊史料》1989年第29期）一位当年曾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在谈起往日经历的坎坷时，“说他一点也不埋怨杜敬同志，即使杜敬当时负责《河北日报》的全面工作。他说，特别是后来在他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得知杜敬同志在那场斗争中也被批评为‘右倾手软’，使他意识到杜敬同志是不愿把他打成右派的。他说：‘在谁也顶不住的情况下，杜敬同志是冒了风险的。’”（见同上书）

在反右派之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杜敬同志又因坚持实事求是，跟不上形势，而多次受到批评，以至最后被调离了《河北日报》。

难怪那些跟随杜敬同志工作过的人们都评说“此人有原则，但不整人”，“此人老人心肠”；难怪如今多少白发苍苍的老战友都经常前来看望他，说些心里话，留影时笑得像个孩子；更难怪，已届古稀之年的著名历史学家丁伟志教授在回忆自己与杜敬同志共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时候说：“有他这位‘主帅’在，作为‘偏军’的我，实在体会到了‘背靠大树’的好处。”（见《杜敬文稿续集》“润物细无声”〔代序〕）

立足于哲学思维高度的共产党人，原本就是心大量宽的哲人，何止容人容事，几能容天容地。哲人并非先天，哲人来自后天的修炼。

（四）语言简洁明快，行文朴实无华，透过累累成果，人们可以体味出这位老领导、老学者对于人生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文如其人。杜老是位内敛、含蓄的人，不事张扬。论文中绝少大块铺叙，更少引经据典（当然“引”也无妨），做到直入主题，论证适度则止，文章剪裁精致，生动耐读。《南疆土地改革中的特殊问题与党的具体政策》一文，是从《南疆农村社会》一书谈起，先是详细总结出南疆过去的土地制度和剥削关系与内地

农村的五条不同特点，随后进入对南疆与内地土改中“共性”问题的分析，列出四条，并非干巴巴列出，而是都有生动内容的具体分析。其中第四条“关于团结大多数”，作者说：“团结大多数，照顾全局，说起来也是尽人皆知的，而实际上却往往做不到，甚至明知故犯。因为，这需要有革命家的宽广胸怀，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有相当的政治和思想水平。而这些，只有加强自身的修养才能达到。”此文从当时最大的政治论题，一直谈到了个人的“自身修养”，这也恰恰表现了作者对于掌权执政者本该有人格至善追求的理解。《在敌人眼皮底下办报》写的是历史，但你品不出散文的生动吗？写的是作者参与的历史，但却没有自我表白，难道你没有体味出行文的背后有个美的人格存在吗？其实作者还有很多短篇，如《咬文嚼字》、《生活“控制论”》等等，篇篇美文，我们不便选入本集。

1983年杜敬同志大病初愈，在青岛疗养的时候，他竟然陆续向《青岛日报》社写了16封信（已收入《杜敬文稿》），向一家素无交往的报纸，提出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建议。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老战士老报人不能自己的责任感，这是对事业、对人民、对民族的自觉的责任感。正因为有这种精神的支持，他才能够以衰病年迈之身，奋斗不息而无忧无虑。因此，杜老将自己的书房名之为“不服老斋”，后又改为“不老斋”。

杜老曾著有《生活散歌》一书，主要是诗、书、画、影之作。让我们以他为其中的两幅画所题之诗结束本文。

其一，杜老的夫人萧寒为友人作了一幅布贴画，在劲挺的松枝上有一只苍鹰仰瞩长空，杜敬在画上所补藏头诗的后四句是：

伉爽襟怀人称道，偕影相随上征程；

长空万里无尽处，寿逾高山大雪松。

其二，杜敬的国画，一盆兰花和一瓶插兰，自题诗曰：

一盆兰花半室香，瓶插两枝陪身旁；
道是室雅何须大，自抹书画挂满墙。

李树琦

2003年5月30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

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	(1)
--------------------	-----

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的后退与前进	(12)
----------------------	------

在土地改革中没收和分配土地	(27)
---------------------	------

再谈“平分土地”	(66)
----------------	------

关于“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几点	
-----------------------	--

思考	(81)
----------	------

土地改革中的阶级路线	(92)
------------------	------

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杰出贡献	(117)
----------------------	-------

四本土地改革史专著读后	(127)
-------------------	-------

南疆土地改革中的特殊问题与党的具体政策	(147)
---------------------------	-------

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教育农民和指导农业	
-----------------------	--

生产	(166)
----------	-------

中国农村发生了根本变化	
-------------	--

——1957年9月在保加利亚国际农业新闻	
----------------------	--

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之一	(173)
---------------------	-------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 262 种报刊	(183)
在敌人眼皮底下办报	(244)
河北省的通讯工作	(256)
报纸的性质、任务和几个基本原则	(265)
增强报纸的党性、思想性、群众性，使报纸 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中更有力的武器	(297)
充分发挥报纸的鼓舞与批判作用	(305)
党报工作者要做冷静的促进派	(314)
报纸的指导性和趣味性问题的	(318)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新闻必须完全 真实	(323)
批评报道需要改进	(331)
谈报纸与实际工作的关系 ——在华北各省市报纸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	(337)
新闻工作者与实际工作的关系 ——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来实习的同学们 谈话纪要	(343)
报纸上要有矛盾，要有生活	(348)
关于编写专业史和地方志的一些意见	(352)
克服宣传工作中的片面性	(366)
一致和不一致	(374)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 保证	(379)
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 的专家	(400)